

林礪儒著

教育危機



香港文化供應社印行

教 育 危 言

有 著 作 權 ★ 不 准 翻 印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港初版

基本定價五元

(外埠酌加郵運費)

著 作 人 林 礪 儒

發 行 人 陳 劭 先

印 刷 者 香港印刷工業合作社
香港威靈道三十二號

發 行 所 文 化 供 應 社

香港：九龍漢口道廿六號四樓 桂林：桂西路三十號
廣州：西湖路一〇二號 上海：河南路三八號

序

抗戰以來，我拉拉雜雜寫的稿子積起來有了幾十萬字。朋友們勸我整理付印，我就選擇一些還可以再看的共得三十六篇，託文化供應社印行。

我在教育界一向埋頭工作，不願多說話。民國十七年我曾對北平師範大學同學們這樣說：

『教育家要培養進步的人格以適應進步的社會，他們取道甚迂，成功甚緩，然而又堅信其可能。所以在未成功之前，教育家總要警氣奮鬥，不必多言。然則警氣與不警氣，是教育家與文藝家之相異點。我們既任教育工作，只合警氣，不該說話。可是「天禍中國」，學校窮死，因之以飢饉，加之以警氣，爲教育家者不亦太受罪乎？！說話若太多了，就會耽於想像的快意而忘卻奮鬥，這自然是教育家之所忌。然而我們生逢今日，既怕警氣致死，那末，以不淫於想像爲限，遇着肚子裏米麵俱缺，而牢騷滂薄的時候，也未嘗不可以「下氣一通」。』

近七八年來，我好似有點警不住，寫作多了一點，最近傳聞某先生給我診斷，說是

因爲營養不良。這是一種唯物論的見解，可以接受。可是另一位朋友馬上給兩種解釋：其一是神經衰弱，其二是「餓其體膚」。畢竟那種解釋正確，這又說不清了。

稿子選定之後，要起一個總名。始初打算定名爲「教育論」，或「論教育」，都嫌容易雷同，最後定名爲教育危言。孔老先生說過：『邦有道，危言，危行』。我們中國，前有四項諾言，後有五大協議，不管怎樣，至少也有丁路綫，有道。那末，在這裏工作的教育者若還不肯危言，就未免太對不起啊！

著者，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於桂林獨秀峯。

目次

甲 汎論

兩年來參加抗戰工作的經驗與教訓……………(一)

今後教育底量和質……………(四)

今後我國知識分子之命運……………(七)

爲學術大衆化進一解……………(一三)

從克利浦斯說到羅素……………(一九)

精神剃鬚論……………(二八)

教育改造與世界改造……………(四五)

憲法與教育……………(五四)

養士……………(六九)

乙 國民教育

國民教育底戰鬥性……………(八一)

丙

民族建國與國民教育·····	(八八)
產業革命與國民教育·····	(一〇三)
中國民族解放運動與國民教育·····	(一三二)
國民教育底輔導和統輔導·····	(一四七)
籌措國民學校基金問題·····	(一五三)
兒童保育與人性改造·····	(一五九)
師範教育	
恭候明日的教師·····	(一六九)
現今師資缺乏是壞現象麼？·····	(一七四)
答檀仁梅論師資饒·····	(一八二)
話說新師範生·····	(一八三)
歷史賦予今日師範教育之使命·····	(一八九)
關於培養師資再說幾句老實話·····	(一九五)
教育自由·····	(一九八)
世界師範教育運動史之戰鬥性·····	(二〇二)

丁 中學教育

四十年來中學教育之彷徨·····	(二一四)
怎樣做中學校長？·····	(二二二)
讀康得耳論中學教育普及之糾紛·····	(二四〇)
國民中學與中國教育之出路·····	(二四八)
論中學公民科·····	(二六六)
漫談課外活動底指導·····	(二七三)
今後中學教育往那裏走？·····	(二七六)

戊 雜 碎

循環論與責任感·····	(二八五)
女權與女禍·····	(二八九)
五四運動底評價·····	(二九三)
八、二七路綫·····	(三〇〇)
話別·····	(三〇八)
一別十年·····	(三一一)

甲 汎論

兩年來參加抗戰工作的經驗與教訓

——國民公論徵稿——

抗戰兩年間，我未曾離開學校工作，老陪着一班青年；在兩三度播遷過程中，雖也常常協助所在地方做點兒民教工作，出征軍人家屬訪問，和後方補充兵團政訓等事，還夠不上說是正地道的後方服務。現在要我說，只好就狹隘的經驗範圍聊貢一得。

第一、在抗戰期間，青年們應該走的大路，要不是求學，便是服務；申言之，應該以服務的態度求學，而以學習的態度服務。可是據我的經驗，現在還未做到這層，中國人舊習，工作固然是爲出身，讀書也是圖出身，這套舊習到了現在還未見怎樣動搖。讀書的青年們，多數心目中還是以升級畢業爲第一，而學問爲第二。服務歸來的又多半是感到不得志，而很少感到自己學問能力不足，這類現象，我認爲是環境使然。青年們實在不乏有志者，而受環境陶鎔，若不降服同化，就難免徬徨煩悶。現在學問技術人才如

此缺乏，誰敢說青年不該加緊讀書？然而制度及習慣若是還把文憑學位看作人格的商標，青年們便不得不力求貼上金牌，而輕視貨真價實，那一套科舉與教會混合物的畢業試學位試，其實早應廢除，可是現在我們還有「我愛其禮」之概。學校課程，都應以致用爲鵠的，而中間分爲許多短階段，使青年們可隨時因環境需要和個人志願，完一段落便可出去服務，也可隨時回來繼續學問。學校變成真正供給學問能力之場所，無所謂畢業，使青年爲所求而來，得所需而去，自然比半真假的畢業試好得多。至於具體辦法，只是立法的技術問題，却不是辦不到的，有志工作的青年們，大抵抱有他們的理想，雖未必全對，可是這是他們勇敢負責之徵。領導者儘可以教育家的態度，懇切指點，使他們得憑着事實實踐而修訂他們的理論，好似不必有許多忌諱，也不必要求他們工作成績硬化於紙片格式上面，更不可使他們感到倚靠人事的奧援汲引？抗戰期間，使青年們各得其所玉成，確是一個要項，所以拉雜說幾句。

第二、兵役規避或逃避也是很值得注意的事：在精神上鼓吹國家民族意識，固屬重要，而據觀察所及，顧慮室家底贍養，確是一個很有力的原因。現在既奉行「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底大原則，各鄉鎮似該有應徵軍人家屬贍養會這一類組織，務期貧家壯丁應徵者無內顧之憂。這筆款項由本鄉鎮內富室負擔大部分乃至於全部，也是公道事。此

外軍隊裏官兵實行同甘苦，也是要着。

第三、民衆教育必須以充實民衆生活內容爲先行條件。好多年前，我的見解如是，經兩年抗戰底印證，更覺其不謬。如果民衆生活還是依舊那樣缺乏內容，就要推行識字教育也不容易，因爲在他們生活裏感不到有這需要。組織民衆並不限於部勒，而必須使他們有至低限度的，一致的生活內容。在生產，交通，衛生，防衛等等方面。自治區域內若能憑事實證明各種生活大衆都有份，都有權有責，大衆都要認識它，處理它，在這裏，教育就呼之欲出，否則民衆很容易誤會出席成人教育班是一種徭役，抗戰是提示我們民衆有共同生活內容的一個極好機會，應該別讓它錯過了。

第四、抗戰兩年來我得到的教訓是：抗戰是我們這老大民族還童的一個極好機會，這場大轉變是必然的，誰也擋不住，也不該擋住。我們所謂知識分子的，不管是青年，是「黃年」，是名流前輩，是無名晚輩，都該誠意地，決心地改造自己，因爲舊腦筋舊習慣不適應這巨變的實在不少。不能老實改造自己的夠不上說改造社會。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七日於融縣榴園

今後教育底量和質

抗戰期間，我們盡力在後方推行義務教育，民衆教育，這自然是在量方面做工夫。而臨時中學，臨時大學種種設置，至少也是使中上教育底數量不因戰事而減少，政府這樣看重教育，確是可喜的事。可是常常聽人說：教育量底激增，使難免質底降落。這自然也道中了多少實況。然而這樣說法，好像是說量影響到質，必然是粗製濫造似的。其實因增量而變質是難免的，而不一定就變壞，也很可以變好，不過變了之後的好，不是原先的那種好罷了。

記得七八年前，我曾經提出國內教育這種矛盾現象：一面看見教育遠未普及，而同時又感到教育過剩。全國學齡兒童入學的不過百分之三十，成人文盲者佔百分之八十，中等學生人數不過全國人口千分之一。這顯然是教育太不足了。然而中學畢業生升學的不過十之一，而十之九彷徨無路；師範畢業生沒有教席，工科畢業生找不着工廠，農科畢業生找不着農場，留學外國習理工農的回來行政機關任祕書科長；每屆畢業，學生們輒同聲大哭『畢業即失業』；教育當局者在厲行其縮減普通中學，取締文法科大學底政

策。這可不又顯然是教育過剩麼？到底是過剩呢？還是不足呢？

前清時代，廣東全省每屆科歲考取錄的秀才名額，因為手邊沒有確實的文獻可攷，不能說出確數，然據我所知，大約估計是四千名左右，即每三年考取秀才約四千名。近年全省每屆參加畢業會考的初高中及師範畢業生就有一萬四千乃至五千。其中高中畢業者約佔五千人。那末高中畢業生約等於舊時秀才底三倍了。初中畢業生全省合計大約多過舊時考試童生了。每科鄉試廣東全省取中舉人八十八名，而近來省內每年各大學畢業約一千人，即大約三十倍於舊時舉人名額，而與秀才名額相差甚遠了。這樣比較，並不是想鑑別舉人與學士執貴，只是要證實取得高等士人資格的人們比較舊時多了好多罷了。常常聽見老先生們批評近來大學畢業學士文理多欠通順，這自然不很冤枉，可是從前秀才文理通順的又何嘗多呢？而且假使現在個個學士都比上從前優廩生甚至於名舉人那樣文理清通，而問題又何嘗解決了呢？

韓愈說得好：『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這是大不得了事。原來在中國舊社會，讀書人——士人——是多不得的，多了就會出毛病。因為停滯在小農業、手工業狀態之下，大多數民衆無須受教育，而大一統的專制帝國，既沒有世襲的貴族，就必須有少數士人與皇帝共治天下。他們是勞心者、是治人者，是食於人

者；換句話說，讀書就是準備做官，是準備食於人——喫人。這種人就不能多，若多了一個士人，便少了一個農工，喫人者衆，而被人喫者寡，這便不得了。韓老先生是忠實擁護士人階級的，是熱中做官的，他看見老道和尚也和官紳士人一樣地食於人，曉得這是危機，於是乎大原其道，要把老道和尚們「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就是要他們還俗耕田，「出粟米麻絲以事其上」。在舊社會裏，這觀點是對的。近來取締文法科大學及普通中學底見解也有好多分和韓老先生一樣。韓老先生掌教國子監，而還不免妻兒啼飢號寒，大概他曉得是給和尚老道分薄了份子。民國十二三年，南開大學學生們發表一篇輪迴教育，教授們大生氣，認為侮辱師長。那時我曾說這是嚴重的教育問題。虧青年們煩悶之餘，慧心偶得；教授們不虛心研究，而竟被虛面子蒙蔽了理智，未免太可惜了。

民國成立之後，教育是無疑義地必須盡量推廣，趕快普及，可是若還是和從前同樣的性質，養成士人，準備做官，其弊必不免與從前相等。二十餘年來，民國其名，而封建其實，由是教育也現代其形式，而科舉其精神，數量又加倍激增，就難怪其「畢業即失業」或「輪迴教育」了。

這回全民族抗戰，一心一德要建設三民主義的中華，教育就非急進不可。然而必須

把往日準備官僚的教育變質爲訓練公民的教育。一般普及的教育，第一要使人人都能運用四權，這便是政治訓練，而決不是舊日文科那樣地只曉做官而不能做人的。第二要人人都能使用現代的生產工具，這是生產教育，而決不是準備「輪迴」的。第三要人人都能使用現代武器，這是軍事教育，而不是製造小軍閥。這樣的數育非趕快普及不可。由此而上的教育，我以爲第一必須剷除學位資格等等帶有科名臭味的階級，破除院系科別底間隔，第二須隨着社會國家底需要和個人的志願，隨時供給人們以所需的學術，理工農醫固然必要，而文學法政也斷不能少。學生們來學一年也行，兩年也行，乃至於三五七年也無不可；總要使他們有所得而去，再有所需而來。這才是教育機關，學術機關，而不是「輪迴」。那末，帶有封建臭味的門戶派系也可以消除了。我以爲抗戰教育底輪廓應該如此。

一九三九，十二，十。於乳源

今後我國知識份子之命運

——廿九年三月十一開學日講——

據上學期成績底統計，學科不及格者比較操行有缺點者底人數少，這可見大多數同

學對於自己學業尙知留意，而能夠檢點自己行爲的人却少了。重視關係升級畢業的學業，而輕視無甚關係的行檢，這畢竟是舊日讀書人的陋習。又據這次擴大兵役宣傳各中隊底工作情形報告，低年級的隊伍工作較爲緊張，紀律也較嚴整，又可見得高年級的同學們閱歷深了不召暮氣。

記起高爾基作契訶夫回憶底斷片，述一段契訶夫指摘帝俄時代知識分子底話：

『俄羅斯人是奇怪的動物。年青時期，他貪饞地用他碰到的隨便什麼東西充實他自己，但過了三十歲以後，除了一種灰色的廢物以外，什麼都沒有留下。……爲了要活得像人，就該工作，用愛和信念工作。但我們却不能做到。一個建築家造了兩三棟過得去的房子以後，就坐下來玩紙牌，玩過一生，否則混在什麼戲院後台裏面。一個醫生如果開了業，就不再研究，除了醫科新報之外，什麼也不讀，到了四十歲就認真地相信一切病源是感冒。對於他自己底工作意義多少懂得一點的官吏，我一個都沒有碰見。大概他總是坐在首都或省城裏面起草文件，送到茲麥夫或斯莫爾貢去施行。但那些文件在茲麥夫或斯莫爾貢會奪掉誰底活動底自由——關於這，和無神論者不會想到地獄底苦難一樣，官吏是一點也不會想到的。一個律師，因爲一次勝利的辯護而成了名以後，就再不顧到正義，只是爲財產權辯護，買賽馬香檳，吃牡蠣，裝出對於一切藝術都是內行的面孔。

一個演員，比較滿意地演了兩三個脚色以後，就不再費力去研究他要扮的人物，帶上絲帽子，自以爲是天才。俄羅斯是一個無產的和懶惰的人們底國家：他們放狂地吃，喝，喜歡睡午覺，一睡下就打起鼾來。他們爲了要人來照料家務而結婚，爲了在社會上得到聲望而交結情婦。他們底心理是狗底心理：挨打就尖聲地汪汪叫着跑回牠底窠裏，得到了愛撫就仰在地上四脚朝天，搖着尾巴。」

我想誰看了這一段文章，都會覺得這好像是給中國知識分子寫真。社會底存在規定人們底意識，大概舊俄羅斯底社會存在有許多和中國相同之點罷！中國知識分子，受了歷史的社會條件所規定，向來在統治者與民衆底中間討生活。他們底生活路線是「獲於上而治民」。既然是「治民」的，當然要爬上民衆頭頂，而其所倚仗的便是統治者底勢力。要這樣，他們才能夠分潤統治者聚斂剝削所得的餘瀝而「不以爲泰」。他們的口號雖然是「寡尤寡悔」，「守先生之道」，「信於朋友」，「守身以誠」等等；而老實說：一切學問，才華，信用，名譽，都是換得「獲於上」底工具。這個歷史的，社會的條件，限制了中國底學問，藝術，政治，道德底發展，其中最優秀的也超越不了這限制。例如「仁政」「王道」底政治理想，究其實也不過「一日一金蛋」主義；就是說：別一下子把母鵝殺了，應該留牠每天給我們下個金蛋。在這自然沒有分析地說明底餘暇，只

想指出我們的知識分子在這樣社會條件之下，被造成許多不良風習。而這類惡習，今後決不容我們不改造。

第一，不做平民：號稱四民之首，介在統治者與民衆之間，最大目的是往上爬，就算做不了官的，也要盡力結交官紳而自別於平民。自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以後，結交洋員洋商洋教士也算是一種榮耀。偶然也發出看重民衆底論調，例如「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可覆舟」之類，那不過是對着統治者說句危辭，使他動聽罷了。碰着亂世，也有加入草澤綠林的。然一旦物色了真主，也就邁步上凌煙閣去了。我們的知識分子有了這種惡習，直到現在，遇事還不能平等合作，盡自己一份義務，而動輒鬧意氣，立門戶。

第二，不守法，不守紀律：因爲法律向來是箝制平民底工具，而知識分子既不甘做平民，自然以守法爲失體面的事。直到現在民國，而我們的知識分子還要求自己站在法律之外。紀律與投機是決不相容的，而知識分子求顯達，只靠着投機鑽營。在中國底士大夫底社會裏，您如果請求朋友守法，重紀律，那是等於侮辱他；要肯通融才算夠朋友。

第三，絕對利己，小己之外，一切人，一切事物，都該給自己做利用底工具：知識分子底地位，不是靠世襲繼承，而要憑自己掙扎。因此，就連小團體的，階層的自利也